

# 西川满殖民文学的后殖民解读

朱双一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摘要] 日据时代在台日人之“文艺总管”的西川满, 其作品貌似唯美、神秘、浪漫, 其实流溢着自以为“高等”、“文明”民族的自傲, 以及对于异族被殖民者的卑视。他观察和描写台湾民间习俗, 追求异国情趣的创作, 乃是力图拥有“他者”的秘密, 以加强殖民统治的“永久等级秩序”。与当前后殖民批评相较, 令人惊叹于台湾作家出于切身感受的对殖民文学之普遍性特征和弊端的认知之早、深刻和准确。

[关键词] 西川满; 殖民文学; 后殖民批评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677(2002)1-0028-07

近十多年来, 西川满的作品频频被翻译后刊载于台湾的一些报刊上, 并结集出版。台湾文坛对于西川满的评价, 本来并不成问题。前辈作家常骂西川满为“御用作家”、“欺台作家”, 陈映真称“骨子里嚣狂的皇民军国主义才是西川的基本的、真实的性格。”<sup>①</sup>然而从 70 年代末开始, 以张良泽为首, 部分台湾作家却试图扭转对西川满的上述评价。张良泽称赞西川满是个热爱台湾的作家, “如果没有西川满的存在, 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运动, 必不能那么盛况, 那么丰收”; 并对“御用作家”、“欺台作家”说提出质问<sup>②</sup>。陈千武宣称: 台湾文学史上, 没有第二个作家, 写台湾题材的诗和小说, 质与量, 可与西川满相比<sup>③</sup>; 叶石涛则称西川满“对台湾文学的贡献有目共睹”, 令人“惊讶于他留在台湾文学的巨大足迹”, 其“坚强的作家

灵魂值得吾人钦佩”<sup>④</sup>。

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如果用后殖民理论加以观照, 或许就可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和鉴别。

## “高等”、“文明”民族的自傲

褒扬西川满者, 常常以西川满的诗人气质、罗曼蒂克的异国情调、唯美的抒情表现等为理由, 说明西川满与殖民统治无涉的“纯文学”品格。然而, 将知识活动加以非政治化的超功利伪装正是统治者的常用伎俩。针对此, 后殖民理论旨在揭示知识生产与殖民霸权之间的相互巩固关系, 指出非功利性要求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掩盖知识与权力、知识与统治利益之间的合作和共谋。从后殖民理论的这一视角看, 可知西川满的所谓“纯文学”, 其实并不那么

“纯”，貌似唯美的外表，并无法掩盖其作品内含的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

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其作品中有意无意地流溢着自以为“高等”、“文明”民族的自傲，以及对于异族被殖民者的卑视。他的小说中，常有日本和台湾男女之间的浪漫情缘，其中最多的，是日本男子“英雄救美”的故事。《岳帝庙的美女》写一群歹徒利用汉人对于阎王爷的恐惧心理，掳掠良家妇女到岳帝庙中，痛打虐待，而后贩卖为娼，牟取暴利。迷信的附近住民，听到悲鸣的声音，谁也不敢怀疑和过问。唯有年轻日本男子穷追不舍，扮演了从天（屋顶）而降、舍身救美的角色。《血染枪楼》描写某陈姓富豪的第二夫人，因争宠而对第三夫人极为妒忌，在丈夫死后，即将后者当作疯子关禁，小说中日本人的“我”，受总督府嘱托，调查汉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发现陈家的许多秘密后，同样扮演了“英雄救美”的角色，从窗口吊下绳索，救出了第三夫人千鹤。没想到美丽的千鹤竟也有着一半的日本血统——“我已经过世的母亲也是日本人”。反过来，如果写的是台湾男子和日本女子的情缘，前者大多失去了英雄的光泽，甚至成为带有重大缺陷的反面人物。如《玫瑰记》中，温柔守德的日本女子莅佳子嫁给台湾人为妻，努力适应台湾乡村僻静寂寞的生活，奉守孝敬公婆、照顾丈夫的责任，战后更承受人们对于战败国国民的蔑视。而作为丈夫的“我”，却遇到年轻时的情人美玉而旧情复萌。妻子明知丈夫外遇而不吵闹，仍在乡下孤独生活，不幸为毒蛇所伤。作者笔下日本女子的温柔美丽、宽容纯情，和台湾女子的妖冶作态、肥胖衰老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西川满小说中的许多正面人物，至少也有部分的日本血统。连中国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及其家族，也不例外。《赤嵌记》中有一段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思想活动的描写：“在这渺茫的台湾当一个统治者，有什么稀罕？……对！必须跳出鹿耳门这个地方，到广大的海上南方去。思念不忘的是童年时，听祖母讲的祖父成功义烈和勇武的故事。祖父的母亲是日本人，是祖父感到得意的，而自己五尺体内，也有日本人敢于冒险的血液流着，到南方去吧。”在西

川满这段纯粹出于想像、编造的话中，与其说是郑克塽的思想活动，不如说是作者在自我吹嘘日本人血统之优越；与其说是郑克塽在作着战略转移的思考，不如说是作者将大日本帝国把台湾当作其前进基地，试图占领整个南洋的野心显露。

在另一篇历史题材小说《龙脉记》中，西川满将高等民族的桂冠，戴到了当时日本帝国的盟友德国人的头上。小说写的是刘铭传任台湾钦差时期，聘用德国人别克尔为工程师，修筑台北到基隆的铁路，却因为中国传统的不得破坏“龙脉”的说法，而受到具体施工的清朝士兵的抵制。向来别克尔所苦的是清军素质的恶劣，以及清军军官赤裸裸的收贿，而这次更雪上加霜地遇到了“顽劣的迷信”，几次要放弃不干了。随时安慰、说服别克尔的是总工程师比特兰。尽管他对其同胞说话的口气犹如亲哥哥一样地温和，但流露的却是“高等”、“文明”的德国人的自负和傲慢：

你一个人要放弃工作，那是你的自由，可是你别忘记你是德国人。假若现在你放手不干，会被全世界的人讥笑德国人连一条铁路都无法完成……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获取荣冠。以一日千秋的期待等着你放弃的是那善于处世的人，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人，你有没有想过？

在别克尔的视野中（当然也是作者的心目中）出现的，不外是：逗留在民房偷懒的中国军官，在枕木旁高兴地玩葫芦和赌博的士兵；连掌握指挥权的廖姓军官，“他并非矮个子，可是身高只到别克尔的肩膀”。西川满在矮小、龌龊、懒惰、贪婪、愚蠢、顽劣的中国人的对比下，塑造了高大健壮、认真负责，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正在与台湾固有的愚昧和落后搏斗，为台湾构造着近代文明的德国工程师的形象。如果联系到这篇小说发表于1942年9月，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正与德国法西斯结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德意志民族优越论，正是希特勒为霸占世界而炮制的谬论之一，那小说所包含的殖民主义意味，就不言而喻了。

宣扬日本民族优越论最为露骨，同时也将西川满小说的超功利、非政治的伪装撕得粉碎的，是以二二八事件为题材的《惠莲的扇子》。作品写于作者被迫回到日本之后，属于他自称的所谓怀恋台湾之作，却不打自招地承认了政治上的殖民统治结束后，思想上的殖民观念的长久遗留。小说通过一个爱慕着惠莲的日本人的目光，看着惠莲和她的因积极参与事件而遭枪毙的丈夫仲明的故事。死刑执行时，惠莲不像其他女人那样哭啼，而仲明也因内心不可动摇的信念，表现得异常的镇定。对此，作者将它归功于日本英雄观的教育。在此之前，仲明宣称：“（光复后）我虽然变了中国人，但是相信日本民族的优秀性。有史以来，没有人喊叫亚洲的解放而发动那么大的战争，这不能以一句帝国主义就能解决的。”民众蜂起后，仲明为了暴动缺乏组织和领导者而担忧，这时他怀念起日本人来：“跟中国人一起，就把 50 万的日本人赶走的台湾人，令人慨叹……假如日本人还在，或许会协力解救这种混乱。对加拿大的开拓尽力的法国人，英人并没有放逐他们。今天台湾省的建设，不是阿山开拓的。”当有人提醒他：假如日本人还在，他们只会站着旁观而已，不要把日本人评得太高。仲明回答道：“我不这么想，日本人不应该那么非人情。50 年，不是像兄弟一样有了感情？……说血浓于水，但是 50 年的日本感化，似乎把这一格言撕破了……是日本人使台湾人改变了的，道义上，日本人不应该对台湾人无情，我相信……”

至此作者似乎意犹未尽，添写了这样一个情节：一辆从花莲开往苏澳的巴士，半路遇到国民党士兵，要司机将他们载往台北镇压暴动。司机却喊着“台独”的口号，连人带车开往悬崖，滚落大海。仲明褒扬道：“那位司机是战争中，当过特别志愿兵，受过日本军队训练，发挥了日本神风特攻队一样的牺牲精神。”

日本学者尾崎秀树在对日本那段殖民历史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判时，对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以及二二八事件中，台籍原日本军人的表现作了分析。光复初，一个和青年尾崎同伍的台湾人“学徒兵”对尾崎说：经过 50 年的日本统治，台湾的生活、文化水平已经高出中国，

台湾已经没法儿跟着（落后的）中国走了，只有第三条道路——“台湾独立”，从而和日本、中国平等交往。几年后，尾崎听说在台湾中南部武装蜂起于二二八事变的民众中，有不少台湾人原是日本军人，特别是曾被征召到海南岛作战的原日本军人，战斗尤为骁勇。为此尾崎痛切地质问道：“当这些从战场上回来的台籍旧日本军人或军属，拿起武器在事变中崛起之时，到底受到多少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影响？”并指出：这“只能说日本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伤痕无乃太过深切”。应该说，二二八事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件，其中既有反抗国民党官僚统治的成份，不可否认的，也混杂着一些受日本殖民统治的精神毒害，与日本殖民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产生了对于祖国和民族的分离倾向的人。这些人成为某些紧抱殖民主义不放的日本人欣赏及寄望之所在。1998 年 4 月，陈映真在《联合报》发表的《精神的荒废》一文中写道：

殖民者破坏被殖民者的主体性、剥夺被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对被殖民者强加思想、意识形态的同化，特别有效地使被殖民精英认同、同化于殖民者的史观、世界观、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而当殖民者离去，这些精神的歪扭依然顽强、长时期滞留下来。

50 年的殖民地统治，40 年代的皇民化运动，使一些殖民地精英妄以为自己在殖民地中现代化、蜕变成文明开化的人种，妄以为台湾的文化生活因殖民统治而高于中国，从而必欲抛却自己的祖国，企图独立。<sup>⑤</sup>

这一发挥了后殖民理论先驱弗·范农早在 1950 年代就已提出的“黑皮肤、白面具”之说的论述，深刻反映的正是殖民主义尾大不掉的典型后殖民状况。

### 异国情调描写中的殖民意图

如果说上述西川满小说中的殖民话语颇为明显的话，那对他那些台湾风俗民情、异域情

调描写的性质的认定，则较为复杂，因这些描写有着唯美、神秘、浪漫、抒情的质地，打着观察、研究和了解台湾民间习俗的旗号，乃至披着慕恋台湾、热爱台湾的外装。不过，借助后殖民理论加以分析，其本来面目也就昭然若揭了。

根据艾勒克·博埃默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一书中的说法，从殖民过程的最初之日起，不仅一般意义上的文本，而且包括广义的文学，都在支撑着对其他国度的阐释努力，这些文本还留在本国的读者能够去想像殖民开发、西方的征服、民族的勇气、新的殖民获取等等。欧洲商业冒险家向已知世界的边缘进发时，他们随身携带的并不仅仅是沉甸甸的文化自信和对于盈利的敏锐嗅觉。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一种鲜活的好奇心。非洲和印度，“无法穷尽的”东方和美洲新大陆，这些地方对于孜孜于探索的欧洲想像力来说，充满了神奇。旅行意味着想像的期待，而到了遥远的彼岸之后所接触到的实实在在的宝藏和古董，以及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文化中的人类，又都会进一步增强这种期待。殖民迁徙的欧洲人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面临如此众多的新的地理、文化状况，为了破译那不熟悉的领域，所凭借的就是他们手头掌握的程式化的描述和具有权威性的象征（如《圣经》、《天路历程》等），他们把已经熟悉的、已经成为沟通手段的各种比喻用于尚不熟悉或存有疑问的语境中。这样，凭借着日常使用的名称和文本惯例，奇怪的东西便渐渐变得可以理解了。同时，西方对于东方的构想，有时就采用了它自己所幻想的天堂般的东方形式。如《天方夜谭》的种种意象，充斥于当时诸多的殖民文本，而海难沉船、异地扎根、建立文明、探宝、奴隶、对食人生番的恐惧等主题，在殖民主义浪漫文学和冒险小说中，不断出现。或者说，欧洲在国外殖民的同时，也对外国的故事进行殖民占有<sup>⑥</sup>。

西川满的作品对照于博埃默所言，有着许多相符之处。陈明台在《西川满论》中称西川作品的几个基本的要素——唯美、趣味性、猎奇性、抒情性，浪漫和人工装饰的个人偏好等等，导致他的文学带有吸引读者陷入无止尽的

梦幻与空想的性质。然而根据博埃默所言，这种猎奇和幻想的异域情调，其实并不西川满的独创，而是殖民文学固有的性格。西川满的小说中甚至不时出现“就像《天方夜谭》”之类的话语，而《恋情与恶灵》中有海上遇难情节，《龙脉记》涉及建立文明主题，《青鲲庙的艳姿》可说是一个探宝故事的中国版，《玫瑰记》中日本女子始终立足那片土地，某种意义上也可作为异地扎根的举动来解读。编造出第二夫人虐待第三夫人传奇的《血染枪楼》中，提到作者从中国史书上看到吕后出于妒忌而指戚夫人为“人猪”，断其四肢，毁其耳目，关入厕所的故事，提示我们注意到这小说确实有点像是吕后故事的现代台湾版，也说明了西川满“殖民占有”的中国故事中，也包括中国的历史故事。

与此同时，正如西方作家进行东方构想时，依赖着《圣经》等西方权威性的象征，西川满在驰骋其台湾幻想时，也依赖着其本民族的文化。《神明祭典》中，汉民族的城隍爷祭典仪式，被写成一个以复仇为主题的浪漫故事。“我”因为怀疑当童丑的哥哥的死，是为人所杀，因此想利用游行时，对犯嫌者行刺。后因“我”的情人彩娥正是嫌疑者的妹妹，准备替哥哥牺牲而作罢。虽然故事的外表有个汉族民间习俗的壳子，但那种敢于假借民间信仰的仪式而行杀人之实的做法，以及拟采取的吹毒针杀人的方式等，其实都是日本式的。作者基于其本民族的文化而进行浪漫想像，编造出充满日本文化气息的汉族故事。虽然对于宗教祭典、神像出游的场面写得有声有色，其实与台湾的现实有着很大的距离，充满着凭空想像的味道。

博埃默还指出，作为权威性之显化的殖民凝注也表现在“研究”、科学调查、文献记录和考察报告等主题中。从18世纪中叶起，在殖民地这个领域中，欧洲人总的来说一直自视为公正的科学工作者，理智公允的知识采集者。他们对“他者”进行细察的兴趣似乎永远无法穷尽。他们甚至想要测量非洲某国王之妻“喂奶部位”的各种数据，在“清晰地看到她的裸体”后，一一量出这女人的胳膊、大腿等部位的尺寸。而这一测量实验得以进行，显然是由于欧洲人自认为他有权利对非洲人作如此详细的检

查。博埃默还以泰勒《一个刺客的自白》为例，指出该小说是“为了让英国的人了解情况”而讲述的，书中的细节意在满足英国听众对当地风土人情的的好奇心，也为了提供必要的知识，使得殖民统治更加深入人心<sup>⑦</sup>。无独有偶，日本在占据台湾后，也表现出对台湾地理、历史、民族、社会等加以细密调查和研究的浓厚兴趣，相关的考察报告、文献记录汗牛充栋。西川满对台湾民俗的关注和描写，即属于这种风气的一个表现，而他小说中的日本人（有的即作为叙述者“我”），不少即是以正在调查历史、民俗等的学者的身份出现的。由此可知，艾勒克·博埃默在其书中所指出大英帝国之殖民文学的若干特征，我们竟能在东亚帝国的西川满的作品中，看到诸多类似之处。西川满创作的殖民文学性质，昭然若揭。

### 殖民文学遭遇后殖民批评

西川满文学的殖民主义性质，其实许多台湾作家早就有所认识。早在 1941 年，西川满的理论导师岛田谨二在《文艺台湾》上发表《台湾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试图借助法国殖民者在中南半岛的殖民文学的发展状况等，为所谓“外地文学”勾勒一般性图景。他将殖民地统治划分为三个时期，亦即 1. “军事的征服、未开地的探险时代”；2. “采穷调查的组织化时代”；3. “物情平稳，移住民开始思图作物心两方面的开发，也就是所谓的‘纯文学’产生的时代”。他认为，“首先军事上，政治上的征服就会有战记和纪行等文献，但文化普及而物质、精神双方面的开拓一进行，才会出现 imagination 的文学”；而从外地居住者怀有的心理必然性来说，“其文学的大主题可分为：外地人的乡愁，描写其土地特殊的景观以及土著人外地人的生活解释三种”，并认为这些要称为 exotisme（异国情调）文学最为正确。<sup>⑧</sup>岛田谨二并在其所著《华丽岛文学志》的第 12 章《西川满的诗业》中，应用上述理论，对西川满的作品作了诠释，并将它称为本国（日本）文学史的延长。

然而，殖民者西川满的作品，即使在他当红的时刻，也未能获得被殖民的台湾作家的认

同。当时因某些特殊原因而成为《文艺台湾》同仁的台湾作家龙瑛宗，也对此追求异国情趣的“外地文学”论十分不满。他曾在《文艺台湾》上撰文对此创作路线作了批评。1941 年 2 月发表于《大阪朝日新闻》的《台湾文学的展望》，更对此论作了颇为深刻的论析和批评，写道：

外地文学的性格，带有只要求表现异国情趣的倾向，其实需知那不过是附带的条件，并非主要的条件……

异国情趣并非住在异国情趣中的人的欲望，不过是那些在异国情趣圈外人的好奇罢了。住在异国情趣中的人所创作之文学，即令不意识到异国情趣，其情趣亦自然会流露于外，我们绝非为了异国情趣而创作……

是故，所谓外地文学，并非以本土（指日本——朱按）的文坛为进出之志的文学。应该是就当地而作的文学，既非模仿本土的文学，也非对外地作皮相式描写的异国情趣文学。外地文学的气性，不是乡愁、颓废，而该是生长于该地，埋骨于该地者，热爱该地，为提高该地文学而作的文学。这种文学并不是消费者的文学，而是生产者的文学。<sup>⑨</sup>

龙瑛宗并具体指出西川满作品之远离台湾现实的要害，写道：西川满等“均非坐在泥地里，滚落一身泥泞，拉开嗓门高扬人间哀歌之作家”。

如果将龙瑛宗对追求异国情趣的殖民者文学的批评，和当前后殖民理论对于“东方主义”和殖民文学的批评相比较，不能不惊叹于殖民地作家出于切身感受的对殖民文学之普遍性特征和弊端的认知之早、深刻和准确。或者说，殖民文学的特征见诸于各殖民地，也印证于台湾；它为近来的后殖民理论所揭示，但早在日据时期，台湾作家对此已有相当的认识。

西川满的不少台湾题材的作品，其实写于战后被迫离开台湾这块“乐土”回到日本之后，可说更符合于“后殖民主义”之名实。用西川

满自己的话说，“是因日本战败，不得不离开我心里决定的终身住家的台湾，我对已经成为遥远的岛抱持难以忍受的慕情，永不消失的赞颂，一天又一天，用力敲打似地写出来的东西”。这些小说被台湾本土派作家引入台湾，赞誉有加，特别是西川满自诩的台湾之“爱”，得到众多的称许。然而，陈映真等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写道：

如果西川满深“爱”着台湾，则毋庸置疑的是，当年许多前来殖民地台湾投资、做官、探险的日本人也深“爱”着台湾的。问题在于：西川之爱，是支配者民族以他自己为本位去理解，去看殖民地台湾，从而投注他的感情。从“第二代”在台日本殖民者看来，台湾有南国之美，有古台湾历史的神秘感，充满着叫人向往的“华丽”的异国情调。但是对于殖民地的儿子杨逵，台湾是充满着殖民地内部矛盾，是一个一触即破的脓疮；是疲惫破产的农村，是充满着民族压抑和荒诞支配的地狱。但对于西川和他的老师吉江乔松，台湾是“南方，光之源，赋予我等以秩序、欢喜和华丽”（近藤正己：《西川满札记》）的人间乐土，是精致的个人情趣（例如西川满在台出版的杂志、书刊的封面设计和装帧设计）。西川满的台湾，便是这样一个“人工的、空想的、幻想的”、“二世”殖民者心目中的乐园（近藤正己：前揭书），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真实的台湾生活和台湾人民，对于西川满，是视而不见的。<sup>⑩</sup>

此外，张良泽对西川满推崇道：“观西川氏之杂志和著作，就知道其内容殆为充斥台湾民间的卑俗的故事、传说、风习等，取之为文艺，从而把素来被忽视的素材，因西川浪漫的情绪和艺术性技巧，一变而升登文学的殿堂。”<sup>⑪</sup>这里所称“素来被忽视的素材”，其实并不确切。台湾民间的故事、传说，在日据时代就颇得台湾作家的关注，曾有台湾民间文学故事集等的整理和出版；而民间风俗习惯，更是当时台湾文学创作中出现频率最为密集的题材之一。日据

时代台湾作家的民俗描写，可分为两个时期。从20年代至抗战爆发之前，受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和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影响，台湾新文学着重揭示和批判蓄妾、养女（童养媳）、赌博、普渡、包办买卖婚姻、求神治病、迷信风水等封建陋习。在抗战爆发，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皇民化运动，对汉民族文化施予禁压、清除和同化政策之后，台湾作家民俗描写的主题和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民俗描写成为台湾作家试图保存汉民族文化于不坠的婉转、隐蔽方式。不过，即使在前期着重批判封建陋习的时候，台湾作家对于汉民族代代相传的风俗习惯，也绝无鄙视之意，而是视之为自己身上的毒疮病疽，试图运用科学和民主的手术刀，对之施以剔骨剜肉的疗治，以求恢复自身肌体的康健。这和西川满以局外人的身份看着别人家发生的事，觉得其卑俗之至，甚至产生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优等民族，将为落后民族带来现代文明的态度，有着本质的区别。1984年，陈映真发表《西川满与台湾文学》一文中，对此有颇为精辟的分析：

在殖民地中，对于文化，一贯存在着两个标准。从殖民支配者的文化以观，殖民地的‘故事、传说、风习’，莫不‘卑俗’。但从被支配民族自身的立场以观，这些故事、传说和风习，尽多优美而堪足自傲之处。即使从更激进的革新的立场去看，殖民地反抗的知识分子固然也在自己的文化中看到其鄙陋、落后之处，并且进一步为了图强而对自己文化中黑暗、落后的成分痛加撻伐，但这又与以日本人立场，以事不干己的态度，从爱殖民地神秘，异国性的趣味，既连腐朽，衰败的东西也大加赞美，两者之间，有迥然不同的意义。

像这样的论述，其实与后殖民理论已有不谋而合之处。后殖民理论认为，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殖民主义类型。第一种把自己的焦点集中于对于领土的物理占领；第二种则关注文化和心理的占领，它标榜殖民主义乃对于野蛮世界的文明开发的先驱。现代的殖民主义既依赖

军事力量对殖民地施行暴力的占领,但它也透过设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主体与知识的永久等级制度而实行另一种暴力——知识或文化的暴力。为了把西方呈现为文明之地,被殖民的世界就必须被贬低为野蛮原始之域。如果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可直观地视为主人和奴隶的关系的话,在这关系中,奴隶成为依附性的“东西”,其存在是由得胜的他者(也就是主人)形塑的。陶东风曾引用萨特(J·P·Sartre)所说的:“我被他者所拥有,他者的眼光赤裸裸地建构我的躯体,把它如此这般地生产出来,用我永远不用的方式看它,他者拥有我是什么的秘密。”<sup>⑩</sup>我们可以说,西川满充当的即是这种“主人”的角色,他的民俗调查和书写,乃是力图拥有“台湾人是什么”的秘密,其最终目的,在于造成所谓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永久等级秩序”。而台湾作家在进行民俗描写时,却是要诊断和医治自己肌体上正在腐烂疼痛的疮痍。这也就是龙瑛宗所谓“我们绝非为了异国情趣而创作”,而是“生长于该地,埋骨于该地者,热爱该地,为提高该地文学而作的文学”。

由此可知,在后殖民理论出现并传入台湾之前,部分台湾作家在对日据时代台湾文学以及在台日人的具有殖民意味的作品进行审视时,其实已采取了与后殖民理论类似的视角,并因此获得了深刻的认知。这说明,有着相似的经历,面对着相似的问题,一些以反对殖民主义为己任的台湾作家,与后殖民理论是灵犀相通、

不谋而合的。而后殖民理论在与台湾文学的接触中,亦将大有可为。

注释:

①陈映真:《西川满与台湾文学》,台湾《文季》一卷六期,1984年3月。

②转引自陈千武:《译者的话》,《西川满小说集2》,高雄:春晖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③同上。

④叶石涛:《西川满与“台湾文学”》。

⑤同①

⑥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7,51页。

⑦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第82~83页。

⑧译文刊于高雄《文学台湾》第23期,1997年7月。

⑨转引自罗成纯《龙瑛宗研究》,《龙瑛宗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4年初版三刷,第262页。

⑩同①

⑪张良译:《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转引自《陈映真作品集12》,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⑫陶东风:《后殖民主义》,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公司2000年版,第16~19页。

(上接第9页)

大家或许也注意到了,这篇小文在行文语气上可能存在着某些过于偏激的弊病,但是我们绝对没有执意与谁过不去的偏狭心态。用“爱之深,责之切”或许更能体现我们这一阶段以来对整个学科发展的思考过程的两难心态。作为忝列于这一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我们是在借用当下流行的诸种“批评武器”仍深感困顿迷惑之余而进行十分痛苦的思索的。事实上,本

文中所指陈的本学科迄今为止的局限和不足,也同样清楚明白地存在于我们自己过往的批评实践中(甚至也可能包括以后,因为这实在是一种难以挣脱的习惯力量)!笔者无力实际也不可能在这篇小文中提出或构建什么方法论体系,充其量也只是提出一个希望引起注意的论题,权作引玉之砖,如能引起诸位同行方家的注意与批评,则幸莫大焉!